

彝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

王俊 著 民族出版社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成果
项目批准号：12JZD010

彝族非物质 文化遗产 研究

王俊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 王俊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 - 7 - 105 - 14125 - 8

I. ①彝… II. ①王… III. 彝族—文化遗产—研究—中国 IV. ①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3885 号

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策划编辑: 罗 焰

责任编辑: 陈 萱

封面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16.75

定 价: 4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4125 - 8/K · 2473 (汉 1378)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系列

主 编：张学立

副 主 编：王明贵（常务） 王继超 王 俊
禄玉萍 马 辉 张斌峰 杨岗营

编 委（按姓氏笔画从少到多顺序排列）：

马 辉	王 俊	王明贵	王继超
史昭乐	吴 颢	李平凡	陈兴才
张学立	杨岗营	张胜前	张斌峰
罗世荣	黄卫华	禄玉萍	

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系列成果

(总序)

张学立

“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系列”(下称“丛书”)共计十四部著作,系本人领衔申报立项的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项目编号:12JZD010)的重要成果。本项目是继《中国彝族通史》之后关于彝族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重大综合性项目。本项目的成功立项,以及这套丛书的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项目评审专家的信任和实施过程中教育部社科司相关同志及省内外专家给予的指导帮助,同时还要感谢民族出版社编审罗焰女士及其同事为丛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劳。

本项目的研究以及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对黔西北地区濒危彝族钞本文献的调查搜集,翻译其中重点文献,开展田野调查以及多维度的理论探讨,以弥补彝族文化的缺环与断层,将彝族文化呈现给社会,为彝族文化在新时期的传承创新提供理论和实践的论证与启示,为我国的民族文化理论及实证研究提供一个新的个案。

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文化有着丰富的人类学内涵,是一个民族有序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热爱生活,向往文化,则是一个民族繁荣昌盛的不竭动力。历经千百年的冲突与交融,我国56个民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以其无与伦比的连续性、系统性和稳定性屹立于世界东方,其中每一个民族都有其部门职能、外在方式、作品积累以及片段享用方面的文化特色。通过整理民族古籍文献的记载,在此基础上续写出新的篇章,既是弘扬民族文化的一个基本环节,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近十年来,随着网络终端技术以及网络平台的建设及使用,世界正发生且经历着一场由于信息革命而促动的文化变迁。信息化对文化的影响至深且钜,它深深地影响着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行为文化等文化部类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如何对民族文化的存在、来源及规律做出高质量的把握,处理好濡化涵化的问题,成为关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大课

题。为此,有必要重视古籍文献在文化传承发展中的独特载体作用,加强和深化古籍文献的保护、整理及研究工作。党和国家对我国当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精准判断,《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2007年)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年)的发布,有力地助推了古籍文献的保护与发掘研究工作。

黔西北这一地理概念包括毕节市全境和六盘水市大部分区域,其中毕节市是中国四大彝族聚居地之一,六盘水市是贵州省除毕节市之外的第二大彝族聚居地。黔西北彝族历史文化悠久,在水西地区素有“没有千年皇帝,却有千年土司”之说。据清道光二十九年所印《大定府志》载,彝族阿哲家族君长妥阿哲从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受封罗甸王建罗甸国始治贵州西部,直至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水西宣慰使时期实行“改土归流”,以家族世袭制统治该区域长达一千四百七十四年之久。黔西北拥有一个令人神奇的社会治理传统,这是一个世界历史上十分罕见的制度文化传承个案,呈现了我国以血缘宗亲关系维系的政治伦理文化的一个独特诠释。

黔西北古老神奇的彝族土司制度为彝族文化的丰厚积淀创造了条件,无论民族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及风俗,还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或接受的其他才能和习惯,都令其他彝区难以比肩。就黔西北彝文古籍收藏而言,除了部分省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藏品,在“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原贵州毕节专署民委彝文翻译组)、“六盘水市民族古籍办”以及大方、威宁、赫章、纳雍、盘县、六枝等县区的民族工作部门,收藏有近万册古籍,散藏民间的文本则更多。黔西北彝文古籍不但数量种类多,质量亦堪称上乘。被视为“彝族百科全书”的《西南彝志》,彝族毕摩文献中篇幅最长的《彝族源流》,摩史文献中唯一的清代木刻本文献《摩史苏》,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且震动学术界的彝族古代文艺理论《彝族诗文论》《彝语诗律论》,皆为黔西北最具代表性的优质彝文古籍。而且,黔西北地区还有大量的彝文金石文献,在已经发现的文献中,西汉时期的青铜器《祖祠手碓》铭文与《水西大渡河建桥碑记》碑刻在全国同类文献中以年代久远和字数最多而著称。

在国家政策支持及相关专家学者的指导下,在黔西北地区仍然不断有重要彝文古籍被发现,使得有必要对彝文濒危文献做出保护与发掘性研究。在我服务过的毕节学院(现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在2011年至2012年创建“彝族文化博物馆”(一期)期间,搜集到近百部彝文古籍原件和200多部复制件,其中有被称作“牛皮档案”的珍贵古籍原件;我现在工作的贵州民族大学,“彝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也收藏有近五百部彝文古籍原件。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为响应国家民委就做好民族古籍保护与抢救工作所倡导的“救书、救人、救学科”的理念和行动要求,贵州

省成立了一些研究黔西北彝族文化的专业机构，它们已经推出一批在国内较有影响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其中包括《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全译、《彝文金石图录》两辑、《彝族创世志》《增订〈爨文丛刻〉》《彝文指路经译集》《勒俄特依》以及《玛牧特依》等古籍的翻译出版相继完成，并有一套关于彝族文艺理论的丛书（《彝族诗文论》）出版，形成一个彝文古籍文献研究工作的黄金期。

信息化对文化的深刻影响，为深化彝文古籍发掘及研究提供了便利，但是彝文古籍文献研究并没有出现应有的卓著推进，相反，信息文化改变了黔西北彝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模式，黔西北固有的文化生态受到冲击，民族文化之间的涵化变得更为复杂，一些优秀的彝族文化元素濒临丧失。尤其是，电视和网络信息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为异质文化潮流提供了一个“跑马场”，使得黔西北不少彝族原住民忽视对文化适用条件的思考，处于对文化“掉队”的莫名惶恐之中。无论是生活在黔西北的彝族，还是生活在当地或其他地区的世居民族，原住民都面临一个民族文化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下的再认识与自我认同问题。在纷繁复杂的文化冲突与交融中，重建关于民族文化的文化自信，发挥其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与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历史担当，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社会性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的反思，不断彰显一种民族文化自觉的重要性，古籍文献发掘研究及宣讲于此的不可替代作用随之凸显出来。彝族文化的特殊价值，以及新时期研究彝族古籍文献的意义，已经得到政府有关部门以及相关领域专家的重视。本人领衔申报的《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以及项目系列成果在民族出版社的出版，就是于此的一个明证。

综观时代发展的境遇，黔西北乃至其他地区彝族文化与其他世居民族文化不无相似之处，但是，黔西北彝族文化传承创新所面对的问题也有其特殊性。在传统媒介信息传播时期，黔西北地区交通闭塞，在历史流转过程中的发现和发明相对较少，群众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基础设施薄弱、资金及人才技术不足等问题十分突出，然而，在新媒体信息传播时代到来之际，尽管黔西北的整体样貌并没有得到彻底改观，但是她已经因为新媒体信息传播与发达地区站在文化传播的同一起跑线上，急需一种系统的文化整体性重建。我在黔西北学习和从事教育、管理工作二十多年，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该地区的第一个彝族哲学博士，与彝族各界的交往以及我对彝族文化和其他世居民族文化的内外审视，使得我更愿意将民族文化发展问题理解为一个如何通过教育实现自我反思和自新图强的问题。我希望通过乡土教材及校本课程的开发，在民族地区各类现代教育教学中融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元素，积极建设多民族文化的良构关系。正因为如此，《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项目的立项和运行以及

这一套丛书出版的价值与意义,不仅仅在于拯救濒危彝族钞本文献,也在于通过翻译和延伸研究给出一个以彝族文化审视现代社会发展的视角,而这既需要古籍文献的澄清,也需要面向彝族文化传播共享的实际,为彝族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内容与理论支撑,也为其他世居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借鉴。

就项目研究及这套丛书的内容而言,我们希望从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中发现新的关于真理的解释,但不停留于对“褪色残篇”的修补,而是着眼于当今时代发展的“人类学事实”,面向黔西北彝族“集体记忆”的文化确认设置三个基本“板块”,即“调查、抢救与保护板块”“整理与翻译板块”和“理论研究板块”。第一个“板块”集中于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的调查、抢救和整理,依托项目研究及省市各类彝族文化研究平台,通过田野调查、专访与重点对象解析,组织钞本文献的抢救与保护工作;第二个“板块”分为两个递进的方面,一是依据哲学、宗教及文学艺术的分类,整理和出版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总目提要与精品,二是以毕节“东四县”与“西四县”濒危彝文钞本文献的发掘为重点,本着“清楚、明白与真切”的原则精选钞本文献,组织翻译与出版;第三个“板块”主要是对已有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的理论探讨,以黔西北彝族钞本文献解读为基础,以文化人类学的成熟理论以及现当代文学的视角研究彝族古代文艺理论,并通过重点文本的解读,对彝族在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宗教信仰及法治观念等方面的思想精髓做出凝炼与概括。

我们关于项目研究的设想以及这套丛书的内容设置得到国内相关专家的指导或赞同。在研究设想中提出的诸多问题也与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是相吻合的。其中,有三个关于黔西北彝文古籍搜集整理研究的问题特别值得关注。其一,黔西北地区民族古籍工作机构在逐渐减少,存在不利于彝文文献发掘与研究的情况。目前只有威宁、赫章、大方、盘县等少数县设置古籍工作机构,毕节市其他县均已撤销古籍工作机构;县区的古籍收集工作基本停顿,已有机构多数将精力投向古籍保护与翻译,古籍搜集数量逐步减少,价格不断攀升,散藏民间的古籍越来越难以搜集。而且,受市场经济、全球化以及外来宗教的影响,部分老毕摩改信其他宗教,在赫章、威宁等地,甚至发生烧毁经籍或封存入洞永不再用等情况,导致熟悉彝文的人越来越少,彝文古籍传承严重濒危。其二,彝语文专业在弱化。高校已经很难招收到彝语或彝文专业的本科生,彝文方向的研究生更是少之又少;贵州省仅有一家民办学校培养彝语文人才,但是由于专业属性及所颁学历层次较低(中职)等原因,学生的就业问题非常突出。其三,专业人才储备严重不足。一方面,翻译人才匮乏,精通彝文能翻译古籍的专业人员更是凤毛麟角;老一辈翻译专家渐渐淡出,年轻一代难以很好接续,青黄不接的状况早已突显,多数年轻学者需借助他人译作方可开展研究。另一

方面，早年从事彝文古籍的研究者基本上是从从事彝文翻译的人员，在这些人员退出工作岗位后，彝文文献的研究队伍没有得到应有补充，加之从事研究工作报评专业技术职务的难度较大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愿意从事彝文文献研究的人员数量不断减少。

行政管理缺失、人才培养存在短板以及专业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长期存在，不仅导致熟练掌握彝语、彝文的人数在逐渐减少，对彝族风俗习惯了解的人也越来越少，严重影响了对已有彝文文献的理论探讨。从学术团体来看，黔西北彝族人数较多的县市区基本上都成立了彝学会，但是这些学会所从事的主要是活动，离“求真求是”的学术要求尚有差距，偶有一些文集公开出版或内刊印行，但是由于作者专业知识的局限，许多文章停留在复述前人成果或探索创新不足以及浪费人力财力的问题。当然，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和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彝学研究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及影响观之，更新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的努力仍然任重道远。

就《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项目组成员架构及运行情况来看，项目组成员或者长期生活在黔西北地区，或者曾经在黔西北从事相关科研工作，而且皆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其中多名成员还是具有博士学位的汉族、彝族中青年学者。对于上述问题的反思，不仅不断激起项目组成员的家国情怀，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大家关于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研究的积极思考，也激发了团队探索创新的热情。除了本套丛书的出版，项目组成员积极打破学科、单位、体制以及区域条件的限制，集思广益，不仅完成了各子项目的研究报告，还完成近四十篇论文公开发表，在国内彝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

本丛书的编撰及成书适逢我国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一个崭新阶段，信息文化变迁在强劲地推动着我国民族文化的整体性重建，研究编撰者关于彝族钞本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彝族思想文化的研究尚有较大空间，加之在项目研究过程中不得不使用一些相对的规则及方法，我们的探索难免存在局限性，恳请读者给予更多批判性或建设性的解读及包容性的理解。本丛书着眼于濒危彝族钞本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文化变迁的视野下，其关于彝族文化的精神价值、引导作用、人格构成以及集体沉淀的理解可能是相对的，尽管如此，我们在研究编撰过程中不断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自勉，殷切地希望丛书的出版能为民族文化及相关研究产生更多的原创发现提供基础或借鉴。

在课题研究和丛书编撰期间，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布《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2014年），这是在国家层面出台的第一个关于区域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我们相信，彝族文化的价值将借此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

注，黔西北彝族文化的特质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作为民族文化学者，我们将坚持遵循这一重要理念，以前瞻务实的行动为中华文化重要内容之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持续的努力，并在民族文化社会功能的探索中为和谐社会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张学立，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首席专家，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贵州省核心专家，贵州省社科联副主席，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贵州省民族文化学会会长，贵州省彝学研究会副会长。）

序

我刚从国外返蓉，便接到王俊的电话，请我给他即将出版的专著写序，专著名为《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作为王俊的博士生导师，我对专著的内容接触较早，了解相对多一些，十分乐意为他写这个序言。

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历史悠久是历时性隐喻，而文化灿烂则具共时性内涵。从历时性来看，彝族文化包括族源、迁徙、丧葬、彝文古籍等关键词。在四个关键词中，“族源”是点，“迁徙”是线，“丧葬”是面，而“彝文古籍”则是彝族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提供了研究彝族历史无可代替的“自观”依据。“族源”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点，关于彝族的族源，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有北来、东来、西来、南来和土著等学说。其中尤以北来说和土著说最具代表性，北来说认为彝族源自北方的氐羌，土著说则认为彝族是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目前，以土著说为主，兼容了其他民族的“土著说”观点正越来越得到人们的接受和认可。虽然对“点（族源）”的理解不同，对“线（迁徙）”的阐释也存在差异，但绝大多数彝族人以“阿普笃慕”为人文共祖，以“六祖分支”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却是不争的事实，对彝族族源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阿普笃慕”出生地的考释。“丧葬”是彝族文化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其中关于葬法的认识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彝族历史完整性的理解，彝族历史上并非实行单一的火葬，还有土葬等。作为彝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彝文古籍是研究彝族历史文化最重要的文本依据。在历时性的四个关键词中，每一个关键词都具有彝学学科建设的指示性特征，是今后进行彝族历史文化研究需要继续加强和完善的内容。从共时性来看，彝族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可谓博大精深、精彩纷呈，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基于文化保护而产生的一个学术概念，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濒危文化的态度及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就目前来看，国际、国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事

业的逐步发展完善，成长起来的彝族学者与其他学者在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相关研究多为具体区域、具体文化内容的研究，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的成果较少，王俊的《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丰富和充实了这方面的内容。现阶段，进行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主力军是广大的硕士、博士生，他们关于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学位论文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最重要的成果。这些学位论文视角新颖，往往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学术发展的最新方向，研究涉及的学科多、范围广。这是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令人欣慰。

作为一位彝族人，王俊对本民族文化充满感情，并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将这种使命感身体力行地实践起来，通过四年的刻苦努力，完成了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研究。整体来看，王俊的《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理论运用得心应手，田野调查有深度、有内涵。当然，专著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如许多材料仍可继续充实和完善，希望他能在以后的研究中做进一步的补充完善。

王俊是一位政治觉悟高、思想端正、勤奋好学、治学严谨的年轻学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有理由相信他一定能够脚踏实地、再接再厉，为繁荣中国社会科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沙马拉毅

2015年5月20日

前言

作为一位少数族裔，我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识是一个回归的过程，即一个从不熟悉、不了解，到逐步熟悉并充满热爱的过程。作为一位出生在汉族寨子里的彝族人，我从小和周围的汉族小伙伴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共同成长，并未感觉到与其他人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若一定要找出区别的话，应该是外婆每次来我家时和奶奶用彝语进行热火朝天交谈的场景，那是一种我在童年时期无法明了的语言，她们聊得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我常常被这种情景弄得不解。新中国成立前我的外公是地主，母亲在我的小妹不讲卫生时就会讲述她小时候的规矩，如不能随便坐在地上，要坐时必须在地上垫手帕之类的东西。母亲给我们讲述她家的衙门和家丁时我总是羡慕不已，而讲到土匪如何攻打她们的衙门，她和外婆如何在危急之时翻墙逃走时我又常常捏一把汗。小时候最盼望的一件事便是外婆来我家，外婆除了会给我们带来好吃的之外，还会给我们讲述她年轻时的故事。外婆会骑马、会使双枪，她说当年国民党中央军追红军从她家后面的山后经过，很多人都因为害怕躲了起来，她不害怕，还爬到山后看中央军，中央军人很多，他们还曾用水桶机枪朝一处山崖进行扫射，水桶机枪很粗，要用水来冷却枪管，后来我明白了外婆说的水桶机枪的学名叫马克沁重机枪。我的爷爷是云南镇雄牛场却佐陇寡妇家的卫队长，陇寡妇是滇东北赫赫有名的彝族大地主，也是世袭的彝族土司，所辖范围包括现贵州赫章、云南彝良和镇雄等县的不少地方，后来红军长征过牛场时被红军追剿、逃至一个绝壁岩洞中躲藏，红军围山，陇寡妇弹尽粮绝，为了替她的亲人开罪从岩洞纵身跳下悬崖摔死。被陇寡妇打死的红军就埋在她跳崖不远的地方，那里后来成为了烈士陵园。

这些故事听起来很精彩，但这些故事作为地方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只是我知道，很多其他民族的人也知道，大家在一起聊天时常常忽略了故事背后的民族属性，仅将其作为茶余饭后消遣的共资，大家不会、也没有必要去探讨故事背后更多的文化内涵。因此，除了外婆和奶奶用彝语进行交谈的画面外，我成长的过程中并

未受到多少彝族文化的熏陶，在社会生活中甚至都没有什么民族自豪感，直到我准备报考云南大学的硕士生，我需要确定一个报考的专业，这时我知道了有一个叫“民族学”的专业，该专业主要研究少数民族文化，我一直对民族文化方面的东西感兴趣，在确定报考民族学之后，需要确定具体研究哪个民族，我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的民族，也是在那一瞬间，民族意识在我的内心深处觉醒。进入云南大学之后，由于专业的特点，使我有机会到更多的彝区，接触更多的彝族文化。还记得第一次听见彝族敬酒歌时，我被那婉转抒情的曲调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喜欢彝族人美妙的音乐、美丽的服饰，喜欢彝族人骨子里透出的耿直和豪爽，一想到这些来自我的民族，我就无比激动和骄傲，于是，这种民族意识得以复苏。

回顾我的成长经历，我深深地感到彝族文化在传播和传承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和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彝族人悠久灿烂的文化如何得以良好地传承？作为一个初涉人类学、民族学领域的人，我常常在想，当民族或民族文化消失之后，这些人类学、民族学家还会存在吗？实际上有不少专家、学者依存于所研究的民族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家的人文关怀使他们能够得到所研究民族足够的信任，成为对该民族了解较多的人，从而有意无意地成为该民族的文化代言人。于我而言，研究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有“自观”者的热情，另一方面又有“他观”者的理性，是一个可以将“自观”和“他观”视角完美结合的领域，对彝族文化的现状进行了解，探讨彝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开发和利用是我十分渴望去做的事情。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1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概述	2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理论依据、重点难点、创新与不足	17
第四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和主要内容	20
第二章 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维度与哲学内涵	22
第一节 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间维度	23
第二节 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维度	32
第三节 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哲学内涵	36
小 结	40
第三章 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概况	41
第一节 彝族传统民间信仰	41
第二节 彝族传统口头文化	68
第三节 彝族传统表演艺术	87
第四节 彝族传统美术	92
第五节 彝族传统民俗	98
第六节 彝族传统民间知识、游戏与体育	104
小 结	109
第四章 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111
第一节 彝族文化历史传承的现代启示：以黔西北彝族文化的 历史传承为例	112

第二节 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语境的当代演绎	115
第三节 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现状的具体实践	120
小 结	155
第五章 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	156
第一节 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和利用的理论基础	157
第二节 资源化发展是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必由之路： 基于黔西北彝村阿西里西的田野调查	161
第三节 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	167
小 结	180
结 论	181
附 录	185
附录一 田野调查图片	187
附录二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撮泰吉”传承人传承工作协议	190
附录三 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问卷	192
附录四 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问卷调查统计表	198
附录五 中国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名录（部分）	209
参考文献	232
后 记	250

第一章 导 论

本章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目的及意义、研究概况、研究的理论依据、重点难点、创新与不足，以及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和主要内容等进行了阐述。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一、研究的目的

本研究是基于两个动因而产生的，一是希望通过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研究达到推介、宣传的目的，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热爱，并且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民族学是一门国际性学科，拥有自己完善的学科体系，其形成的理论和取得的成果在国际上具有普适性，笔者认为在民族学视野下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成果最有可能得到政府或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而研究本身就是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传承的一次具体实践。二是希望通过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研究，为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提供实实在在的理论支撑和现实指导。相对于世界主流文化而言，大多数少数民族文化属于边缘文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正处于迅速消亡的过程中，就彝族文化而言，保护与传承势在必行，而要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承，我们需要首先对保护和传承的内容、遵循的理论等有所了解。

二、研究的意义

作为首次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研究，本书包含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